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

佛教興盛與社會環境

一九二零年，太虛大師來香港弘法，二十多天的講座，盛況空前，繼而有虛雲和尚，寶靜法師，倓虛法師等多次來港，或是長駐，使整個香港佛教熱烈起來，有些法會參加人數，竟有數萬人之眾，就是在今天來看，仍是了不起之作。

隨後，很多本土法師往中國內地考察學習，回港後，將所學到的在香港開展。畢竟中國大陸地大物博，人才薈萃，值得偏於一隅的香港借鏡。於此，可見香港只是「邊地」，佛教的主力、根源仍在大陸，未來的佛教仍會如是。明日的佛教，不能不關切此點。

二十、三十年代，除了大型講座外，更有大小不同的法會、佛學班等，亦有密宗的傳入，道場的成立。著名的東蓮覺苑，由富紳何東的太太張蓮覺居士發起興建，除作弘法道場外，更有義學等社會服務，影響巨大。此外，還有佛教雜誌的出版，經書印刷，高僧著作印行等。九龍城長安街的西鄉園，地舖是上海素食館，二樓是念佛堂，三樓是經書法物流通處，由浣青法師主辦，不可謂不前衛，影響非小。如果這樣發展下去，假以時日，佛教定有一番新景象。無奈戰爭爆發，日本侵華，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，香港佛教陷於停頓。幸而戰爭只有三年零八個月，否則破壞將更大。自此，佛教慢慢復甦，要到八十年代，才開始有繁榮的景象。

佛教徒心目中的理想如二、三十年代，太虛大師等高僧南來，這些高僧不吃人間煙火，不倚賴權貴，把持正法，高風亮節，佛教如一股清流，純正地影響社會。可是，這些高僧南來，仍需當地的富紳掀頭，加上虔誠的廣大信徒，才能成就。可以說，權貴，富者的護持，起著關鍵性作用。如果沒有他們的領導，在當時貧困的社會，恐怕無法成就。

從以上的事件，除了眾生的福報外，可以看出佛教的興盛與社會環境有重大關係。佛教的興盛，需要有安定的環境，社會的富裕，政治的協作，高僧大德的人材輩出，帝王的扶持。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唏噓，難道佛教不能像蓮花一樣，在混濁中清淨自在，難道佛教不能孤高雅靜，默默改變社會嗎？

民國時期，出家人及寺院俱在深山中，在孤高隱世中承傳聖教慧命，一般稱為山林佛教。自太虛大師來港公開演講，震撼教界外，對社會文化界亦產生深遠影響。自此，不少高僧南來，本土法師亦北上考察，帶動整個佛教。人們開始意識到佛教的重要性，佛教的珍貴，大眾對人生的渴求，對佛教的渴求。為了利益人羣，宣揚聖教，佛教必須深入民間，如太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。佛教開始從山林走進都市，是為都市佛教。

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香港雖然貧窮，且淪為殖民地，卻能偏安一隅，相比動盪的大陸，確是安定得多，才能使佛教興盛起來。但日本侵華的戰爭，使香港佛教沈寂下去，需經過數十年的孕育，再度興盛，戰爭的破壞力，不可謂不大。八十年代經濟起飛，社會繁榮，帶來佛教復興的動力，漸漸地一些名人，富豪也開始學佛，對佛教影響更大。

回顧歷史，盛唐時期，由於帝王的扶持，人才輩出，成就很多偉大的事業，如玄奘法師的譯場；姚秦鳩摩羅什法師亦有帝王的欣賞，爭奪；梁武帝深信佛法，對佛教的貢獻，延綿萬代；清朝乾隆盛世，編輯了龍藏；印度的阿育王、迦膩色迦王，對佛教的貢獻，有目共睹。西藏王松贊干布、赤松德贊對佛教的貢獻，起著關鍵性的作用。相反，當政治不穩定，國家陷於戰亂的朝代，佛教亦難以發展，遑論有破壞佛教的惡皇出現。衣食足，始知榮辱，色身不調理好，奢談心靈的富足，似乎不切實際。

從近代的大道場，高級學府的弘法事業看，雖然不一定圓滿或有中正的對向，可是發揮的功效或衝擊畢竟不小。可以說，佛教依附人間，流於庸俗，卻能與眾同和。然而，佛教必須依附權貴，富豪的事實，畢竟悲哀難受。弘法者要做到和而不同，既清高亦迎合大眾確是不易，但過份庸俗，必迷失於世間，喪失本位。如何做到既迎合社會，亦符合佛法的精神，應從佛教的歷史中找尋答案。